

“强救”爱尔兰凸显欧盟两难困境

陈正

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在11月中旬又接近于爆发了。该危机实际上早已显现,但是在2010年上半年被希腊危机所掩盖。希腊危机上半年显示了强大的冲击力,最终导致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台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才暂时平息。如今爱尔兰的局势又有点风雨欲来之势,甚至有人把爱尔兰看做是“希腊第二”。

其实,目前爱尔兰的情况比当时希腊问题还要严重些。希腊危机爆发前,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是116%,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也只有13.6%。而爱尔兰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14.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4%,但由于今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高达32%,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就将迅速累积到96%。因此,基本面的恶化程度上爱尔兰比希腊要快。

但是,尽管欧盟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尔兰

接受欧盟和IMF版的援助,但爱尔兰却一直声称自己不需要援助。这是因为,在危机中爱尔兰和欧盟的利益取向不同。爱尔兰不同于希腊危机的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危机:既有主权债务危机,也有银行体系的危机。目前爱尔兰的公共债务超过1000亿欧元,虽然规模不及希腊在危机前那么大,但爱尔兰银行的债务很高。截至3月31日,欧洲银行业的爱尔兰风险敞口合计高达6500亿美元,其中英国银行对一系列爱尔兰机构的风险敞口约为2220亿美元,其次为德国,共持有爱尔兰债券2060亿美元。

对于爱尔兰来说,如果真正出现危机,主权债务融资成本攀升,那么银行的风险可以成功转移给外国的债券持有人,到时候再接受欧盟和IMF的援助,其直接成本也可以降下来。而由于欧盟各国在爱尔兰银行拥有巨大的风险敞口,而爱尔兰银行坏账巨大,一旦危机真正出现,将给欧盟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也给正在危机的阴影里紧缩的欧洲经济带来雪上加霜的效应。

除了可能遭受直接损失,欧盟更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前有希腊危机未真正解决,再有爱尔兰危机爆发,那说明欧盟之前的危机救助对策已经失败,会大大打击人们对欧洲债务问题的信心,笨猪五国(PIGS)中其他三国的债务危机也会立即爆发,并蔓延整个欧元区,包括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甚至可能出现欧元危机,导致60年来数代人努力的欧洲一体化重新回到起点。

在下次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实施后,爱尔兰局势却再度恶化,这说明救助计划并不完美。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把欧洲和世界的前途,捆绑在一些债务危机的国家身上,导致未来进退两难。希腊已经救了,如果爱尔兰不救,可能以前的救助前功尽弃,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强迫爱尔兰“被救助”。但是,继续救下去就要追加资金,人们预计爱尔兰需要1000亿欧元。这种救助方式,以让核心国家承担“坏孩子”的过错,早晚会上压垮欧洲的核心国家本身。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在希腊危机爆发时,果断地把希腊这样的边缘经济体从欧元区里剔除出去,那么希腊等国家自己通过债务重组或者国家破产的形式,

卸去负担再重新发行新货币,降低劳工成本,希腊经济可以重生,而“止损”之后也会使得那些情况相对较好的几个国家逐渐获得竞争力。但是,目前“钓鱼”式救助办法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加大了欧盟的总体成本,还拉长了痛苦的过程。欧盟正在作茧自缚的困局里挣扎。

不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欧盟如果能放下经济一体化的思想桎梏,不再追求欧元区的扩大,那么在债务危机的暂时平静期,不妨劝说和鼓励一些债务危机深重的边缘国家暂时或者永久地脱离欧元区。即使因为坐等这些边缘国家进行债务重组,损失也是可以计量,风险也是确定的,非常可能出现利空出尽的效应,反而有利于世界对于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信心,有助于它们尽快走出危机阴影。当然,在此过程中,欧洲国家必须彻底废弃过度福利政策,增强劳工领域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欧洲经济才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竞争力。

(作者系东航金融分析师)

实话实说

反通胀垄断国企责无旁贷

舒圣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价格形势,研究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会议确定了四项政策举措,其中包括“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今年下半年以来,各种民生消费品和物资涨幅惊人,加之银行负利率的整体环境,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严重提高,民间对于价格暴涨累积怨气颇多,对于中央出台稳定价格举措更是翘首以待。这种局面的出现,要求政府部门在保持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与保护通胀预期下民众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对经济局势保持高度敏感并据此随时调整工作重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必要时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的提出,其实首先应该被理解成一张“安民告示”。换句话说,它无异于告诉公众:对于价格普涨下的民生疾苦,中央不仅知道而且非常重视,一些网友提出了质疑和担忧;然而,这样的强调却是谨慎的必需,否则很有可能陷于滥用,从而得不偿失越搞越糟。

某种意义上,公众对于价格干预政策,本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过度幻想。须知,价格干预不仅绝非治本之策,而且还是一把“双刃剑”。非万不得已情况下,过滥的价格干预无疑是一种倒退,其副作用与后遗症早已成为危害最大的。

各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定论。即使是价格干预,也必须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和尊重基础上,一旦市场机制的根本遭到破坏,结果必然会由此遁入一种恶性循环。

对于价格干预政策,笔者以为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是垄断国企特别是央企应该承担起主要的社会责任;二是要谨防易于操作且易显政绩的价格干预手段,被地方政府基于政绩需求而急功近利地随意滥用。

在前一点上,垄断国企的合法性依据本就是为了保障国计民生,那么,在此关乎国计民生的通胀时刻,理当首先由国企站出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一方面,人造“油荒”逼宫涨价、天然气涨价、自来水涨价、居民用电涨价等等必须被及时叫停,并且追究迎涨涨价的相关责任;另一方面,像固定电话月租费等不合理的垄断收费项目,应该借此时机进行大范围的清理或取缔;此外,国企上缴国家的红利比例更应该大幅提高,并以此用于补贴弱势群体。

在后一点上,应该认识到地方政府可能会存在滥用价格干预措施的可能。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出台规定,对小白菜等蔬菜价格进行限定,结果最受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菜农,本来的弱势群体生活因此愈加困难。不顾价格上涨的背后缘由与构成因素,仅仅对某种商品价格进行行政限定,看上去似乎很有效,结果却只能是打击供应。在平抑物价难有作为的情况下,粗暴进行价格干预,也许是最简单的,但同时也是危害最大的。

焦点评论

再次加息 还犹豫什么?

朱文晔

面对通胀上升的局面,央行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收紧动作,近期很有可能再次启动加息。

首先,抑制通胀越来越迫在眉睫。商务部最新发布的价格监测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为3.9元/公斤,比年初上涨11.3%,比去年同期上涨62.4%,而大蒜、生姜的批发价按年分别上涨95.8%和89.5%,这显示11月的CPI仍将居高不下。抑制通胀首当其冲的是收紧货币和改变负利率,年内再加息一次,可减轻现在负利率的状况。

其次,今年三季度超出预期的9.6%的GDP增速,表明了中国已经由此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回归到了企稳的状态,国民经济整体向好势头不改,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全年GDP增速保持在10%以上应无太大问题。同时,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将会提升中国出口业的恢复,从而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据海关总署11月10日公布的今年前10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统计显示,1—10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3934.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3%,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其中出口和进口规模也分别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出口12705.9亿美元,增长32.7%;进口11228.2亿美元,增长

40.5%;贸易顺差为1477.7亿美元。由此看出,现阶段加息暂无后顾之忧。

另外,面对持续上涨的资产价格和日益凸显的通胀压力,亚洲新兴经济体纷纷启动新一轮货币紧缩。继中国、印度之后,韩国央行16日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基点,旨在对抗潜在的通胀压力,这也是韩国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外,越南央行11月5日将越南房贷款基准利率从8%上调至9%;澳大利亚央行11月2日将基准利率从4.50%提高到4.75%,这是该行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七次加息;同日,印度中央银行也宣布把回购利率和反向回购利率分别提高25个基点。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纷纷把加息作为应对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周边国家加息,必然对中国构成影响,为中国加息提供更好的环境。

最后,央行行长周小川11月16日表示,目前国内价格上行的压力需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央行将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周小川此次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季度以来,尤其是进入四季度以后,央行采取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频率较上半年加快,力度加大。

总之,央行上调准备金率,并不能说明加息已经由央行调控工具的列表里面移除或者后移,为了防范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加息也许已经箭在弦上。

(作者单位:安邦咨询)



财经漫画

严打内幕交易

唐志顺/图

经济时评

环境责任险何以步履维艰

周子勋

对于日渐强调环境保护的中国而言,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是大势所趋。11月15日召开的中国绿色政策高层研讨会上,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表示,十二五期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将从江苏、湖北、湖南、深圳、重庆等部分省市的试点向全国范围推广。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大量工业企业的污染事故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风险,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利用保险工具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有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促使其快速恢复正常生产;有利于发挥保险机制的社会管理功能,利用费率杠杆机制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不过,环境责任险从实际状况来看并不乐观。在我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来自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对环境责任险的认同。可以看到,在最初宣布推行环境责任险的时候,两家石油集团承诺对此项工作予以支持,但对该保险能否满足环境风险保障需求存在疑虑。它们给出的理由是:公司财力雄厚,可自行解决污染赔偿问题;与现有的保险和基金制度不好协调,两家集团均设有“安全生产保证基金”,该基金已经涉及环保方面;一些污染责任损害,如油污损害的赔偿限额很大,担心国内保

险公司不具有承保能力。

这两大垄断石油集团没有直接拒绝实施环境责任险,但事实上它们在国内一直是享受着某种“治外法权”的待遇。最直接的一个事实就是今年7月份发生的大连爆炸事故,造成整个附近海域受到污染事故,虽然相关部门做出了全面处理,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中石油对此类环境污染事故承担任何责任,相反在事故处理后,还召开了表彰大会。与此事故相反的是,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让英国BP公司陷入巨大的赔偿责任,除设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外,其他法律诉讼还依旧没有结束。这说明,在中国环境赔偿不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对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因此它们不担心污染赔偿的风险问题。

其次是制度设计方面。目前我国的环境责任险是非强制性的,这大大降低了其效果。早前发生的紫金矿业重金属污染事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对于这类高风险企业我们同样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措施,保险公司也同样不可能去积极开展此类业务。

此外,保险赔偿与法律责任追究如何协调也要纳入考虑。从目前而言,虽然已经有了针对环境责任险的案例,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责任的追究在法律上依然是一个盲区,这也是当前环境责任险处处碰壁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在没有理清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从法律的执行上明确责任的追究环境下,环境责任险就很难有真实的效果。

新国际货币体系知易行难

陆志明

“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近期美联储QE2的成行重现了上世纪末那次危机之后,美元泛滥转嫁美国危机的一幕。对此,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时指出:在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行将就木之际,全球经济需要另一位货币体系继任者——布雷顿森林体系III,这一货币体系“可能需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走向国际化、继而开放资本账户的人民币”。

他补充称:“该体系还应考虑把黄金作为通胀、通缩和未来货币价值之市场预期的全球参考点。”按照佐利克的逻辑,二战后货币汇率稳定的强烈需求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而黄金的有限性导致的货币不足造成了事实上的货币政策紧缩效应,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降低导致美元无法继续与黄金挂钩,从而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黄金与美元脱钩,其他货币继续与美元挂钩”。

而最近若干年来不仅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稳步下滑,并且美元货币汇率政策完全依据国内经济状况制订,美联储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承担起世界货币中央银行的职责。布雷顿森林体系II早已在事实上破产,未来世界货币体系亟需建立新的稳定框架。承接前面的逻辑,或许布雷顿森林体系III(如果还有这一说法的话)应该是“黄金与美元脱钩,其他货币与美元脱钩”,也可能是“黄金与美元脱钩,其他货币与黄金挂钩”。

从佐利克的分析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更像是上述两种逻辑的混合物。也即“黄金与美元脱钩,其他货币与美元并行,整个货币体系与黄金部分挂钩”。至于在新的货币体系中美元与其他货币的相互关系,整个复合货币体系如何与黄金建立有限的联系,如把黄金作为通胀、通缩、以及货币价值稳定的指示器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是部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未来的人民币构成的复合货币体系中,美元很

可能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货币。这与货币使用的便利性有关,这也是为何美元取代黄金位置之后,其他货币始终难以逾越美元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如果全世界只采用一种货币,那么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受汇率的干扰将会大大降低。

而采取某种主导货币而非众多货币,要该国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国本身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数据巨大、且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该国决心和能力承担部分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也即不通过货币因素将本国问题传染给其他国家。事实上后一点正是美元遭受其他国家诟病之处,然而从根源上来说,要想使货币政策不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干扰,换作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所以可以预见,未来若干年中美元仍将在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III和II不会出现太大的不同。

二是将黄金与新复合货币体系挂钩,并作为通胀、通缩的信号指示器,这一点可能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实践

中将面临巨大的操作困境。将黄金直接重新加入到货币定价体系之中,恐怕佐利克本人也难以认同,毕竟世界经济的增长早已超越了黄金生产所能提供的极限增速。

而将黄金与复合体系挂钩本意是用黄金作为货币币值稳定的参考对象,但是实际上包括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等多种货币在内的复合体系出于维持本国经贸优势考虑,恐怕很难得出一个得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贸易货币加权指数,更不用谈如何在技术上将黄金与整个货币体系挂钩。一旦某方对复合货币与黄金通胀参考数据挂钩不满,要求提升或降低自身的权重,那么整个新货币体系恐将面临生存危机。

简单的结构往往最为稳定,复杂的结构往往会因为某个微小的因素而崩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尚未完全整合之际,要想实现各国货币之间的有效合作恐怕为时尚早。因而全球货币体系恐怕仍会在强势美元肆虐下挣扎很长一段时间。

(作者为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国际观察